
刘子如的基督教信仰

——重庆历史名人《刘子如自述》文本读解与思考

赵心宪¹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摘要】发表于 1934 年的《刘子如自述》是探询子如先生爱国感情与慈善行状，何以能够整合为“子如精神”内涵要素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子如先生阐释个人宗教信仰的由来，对基督教义的基本理解，热心慈善事业主要行状的全面说明。本文以子如先生信奉基督教义，且能超越慈善行状的宗教活动意义，生成自己民族国家意识的爱国感情的史实，结合子如先生生平史迹的相关资料，学理认识其思想形成过程的精神特质及其价值追求，从而丰富“子如精神”的内涵解说。

【关键词】《刘子如自述从基督教义》；民族国家意识；信仰；慈善

【中图分类号】B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08)12-00313-07

一、问题的提出

通读已经整理出来的，重庆历史名人刘子如先生的百余万字史料，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的爱国感情与慈善行状，即“子如精神”丰富内涵的两个重要侧面。引起笔者特别兴趣的是，这两个方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对立的存在，而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他的爱国感情内涵博大，不仅对有志于民族国家复兴的共产党人给以有力的支持，国家意识凸显；抗战初期，还以 67 岁衰弱之躯，亲率抗战服务团奔赴安徽前线劳军三年，兑现早上年战场上抗击外族入侵的宿愿，“代表着中华民族崇高而伟大的奋斗精神”^[1]。他的慈善行状从其商业经营的开始就有不间断的捐赠“善举”记录，随其慈善事业的扩展而不断奉献社会；更在其商业经营一帆风顺的巅峰时期“毁家助善”^[2]将其资产几乎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晚年不顾身体病弱，关心国是，尽一切可能惠泽乡梓与下层民众，实在是无愧于时代的楷模。

在我们看来，发表于 1934 年的《刘子如自述》（下文简称《自述》）正是探询子如先生爱国感情与慈善行状何以能够整合为“子如精神”内涵要素的最重要的文献材料之一。《自述》不到三千字，文字简洁流畅，观点鲜明，激情奔涌，言之谆谆，是子如先生遗留文字中难得上品，其思想的文化价值，是应该充分估计并清楚认识到的：首先，《自述》是子如先生捐助慈善事业 40 年（1894-1934）一以贯之心路历程的自我事实陈述，言简意赅，佐证子如先生的其他文史资料有很高的信度。其次，《自述》完全可以认为是子如先生阐释个人宗教信仰的由来，对基督教义的基本理解，热心慈善事业主要行状的全面说明。再次，更重要的是，《自述》子如先生慈善行状的宗教活动，与自己民族国家意识的爱国感情之间的关系，作了清楚的逻辑表述，其中“用防外人之文化侵略”的警示，就在今天也没有过时！本文不准备面面俱到全面阐述上文提及的《自述》要点，仅以子如先生信奉基督教义，且能超越慈善行状的宗教活动意义，生成自己民族国家意识的爱国感情的史实，结合子如先生生平史迹的相关资料，学理认识其思想形成过程的精神特质及其价值追求，以丰富“子如精神”的内涵解说。思考有待进一步深化，欢迎批评指正。

¹作者简介：赵心宪（1948-），男，重庆綦江人，重庆教育学院教授，巴渝文化·名人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巴渝文化（名人）研究。

二、“博爱慈善”：接受基督教义的个性方式及其信奉的中国化倾向

《綦江私立青山孤儿院史话》是1990年代原青山孤儿院部分院生，与子如先生独子刘福祥共同回忆整理的“口述历史”材料，对子如先生生前的教诲，录有“良言警句”种种试分类列举如下：

(1 关于金钱:不留金钱给子孙买耻辱。

(2 关于时间:世上最宝贵的是时间，失去一分一秒都不会再来，只有抓住时间，才能多做事。人生最多一百年，床上就要睡掉几十年。在家里找东西，找来找去也要找掉好多年，为什么不能把自己要用的东西放在顺手边，有固定的位置，漆黑之夜也能随手拿到要用的东西，不能把时间省下来了吗?你算一算，这省下来的时间，又可以多做好多事。

(3 关于亲情、人类本性:我们中国有个说法：“子不嫌母丑，狗不怨家贫。”小孩一生下地，不管母亲美与丑，妈妈，妈妈！亲亲热热的要一直喊到进棺材！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可见亲情的伟大。你们看，不管人家怎么穷，哪怕是讨饭，他喂的狗总是脚跟脚地跟在主人后面，形影不离。人群中有些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崇拜金钱、权势，就出现“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现象，甚至把年老体弱，已经无力为他服务的父母也要千方百计作为包袱甩掉。席上酒肉朋友，你哥子，我兄弟，你不吃，我呕气，一转眼，为了一点私利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个你死我活，这肯定不是人类的本性。

(4 关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有钱有枪有炮，有的人摇头摆尾地跟在高鼻子、洋大人后乞讨，出卖自己的人格、良心、灵魂，也出卖民族国家。

(5 关于群体意识:地球上最弱小的动物，可能要数昆虫、蜜蜂与蚂蚁了，它们体小力弱，又没有人类那样发达的头脑。但是，它们一生下来就懂得团结一致为集体，为此而分工去奋斗。蜜蜂采到了蜜，它自己并不享受多少，都带回巢去大家享受。蚂蚁也一样，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享受。一遇敌情，群起而攻之；一遇天灾，团结一致。集体负重搬迁，翻山越岭，在所不惜。千万年来，不管地球上出现多大的灾难，它们这种物种总能存活下来，繁衍至今。我们是“人”是有灵魂的高级动物，良心天平上的砝码，不应该是自己和金银财宝，时刻都应该为自己的群体着想，离开了自己的群体，一个人在世上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上述五个方面的“良言警句”，除了第四条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内容之外，应该说都是基督教义的现实运用与引申，关于金钱、时间、亲情、人类本性与群体意识，可以分别在《圣经》文本找到观念征引对应的具体出处。不过，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不是《圣经》对应出处的语句原型及其是否“一字不改”合乎原典，而是子如先生引用教义的言说方式，与结合个人生存体验“证道”的教义阐释的日常生活化特征。13岁时，“仅带五十三文小钱，步行来渝。初学刻字，继营书铺，稍有积蓄，常入木牌坊伦敦会福音堂，颇受感化，尝以博爱慈善诸教义自勉”《自述》。如此接受基督教义的“洗礼”是与子如先生当时只身从乡村到城市，举目无亲，流浪漂泊，倍受饥谨折磨命悬一线，挣扎于生死关头几乎困顿无望之时，旋被重庆富成路红庙当家和收养的一段个性化人生经历、生存体验分不开。慈悲为怀红庙当家和的义举，让小少年刘子如生存愿望获得满足的同时懂得了感恩，成为其后入木牌坊伦敦会福音堂，不断接受基督教义感化心灵历程的开始。父亲信佛从来没有给子如先生留下什么影响，红庙当家和的慈悲，也没有让子如先生觉悟而遁入空门。子如先生是在个人灾难经历的现实生活经验基础上，悟得基督教义“博爱慈善”真义的。“1924年游历南洋、印度、罗马，考察基督教圣绩；又到巴黎、瑞士、伦敦、加拿大等处演说，见证七十余次^[3]的报道，就非常合乎子如先生个性化的信奉基督教义的特点。

《新新游记》卷三第十章《初赴加拿大》之九，载有子如先生即席演讲的两个题目：“马可福音十四章四节”和“约翰一书四章之爱字”这是现今考试命题的所谓“给材料作文”然而却是子如先生特别擅长的证道(见证)内容——

马可福音十四章四节“即”“设立主的晚餐”、“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约翰第一书四章之爱字”即“神就是爱”有三段：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林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么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么就把惧怕除么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神就是爱”阐释的三段文字，篇幅较长。照录下来，全然不顾“抄书”的批评，是因为《圣经》约翰第一书四章之“爱”字，作为基督教义阐释的基本话语内容与言说形式，非常具有宣教诱导的亲特点和特点。这与《圣经》马可福音十四章四节“设立主的晚餐”所述“食”（吃）的话题一样，都是少年刘子如流浪生活经验中出于生存本能需要的，最刻骨铭心的生存要义。正因为当年的饥饿情结，子如先生竟养成一辈子不论何时何地，不管什么场合礼节，必须按时就餐的特别习惯，表现出对“食”（吃）的话题独特的潜意识敏感。研究者指出：“基督教在中国既是观念的存在，也有教堂、教会和传教士，但它更主要的是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了流行性的生活方式，满足了人的物质生活愿望和需求。中国人心目中的文化不仅仅是观念性的，也是可以被生活、被体验、被证明的文化，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有观念性的基督教，也有生活化的基督教。”^[4]可以说，子如先生接受的基督教就是融入个人生存体验的“生活化的基督教”。

唐代景教“元典”才开始汉语对基督教的叙述史的，学者们认为当时主要沿着两条言说途径传达基督教的意义——忠实于基督教的“原典化”和在既有的佛教思想基础上转述基督教义的“本土化”。前者取文化阐释的普遍性思维方式，回到《圣经》原典，能否真正实现其目标，只能是一种虔诚的想象；后者从阐释者的理解出蕊遵循文化特殊性的阐释思维方式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佛教思想式微之后，信徒个人生活化的理解成为基督教“本土化”的重要走向。而对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教派总称，作为文化思想的基督教，是与其相似的内涵意义、相同的信仰情感、信仰观念和理想，不是被传教士，而是被信奉者阐释普世的，这也合乎“有多少基督徒，就必然会有多少种信仰”的传教历史规律。子如先生对于自己作为商人信奉者，而不是基督教牧师的传教角色定位就是一个实例。^①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文本与观念的层面，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文化层面的日常生活化可能更丰富更生动。张爱玲就这样说过：“现代中国电影与文学表现肯定的善的时候，这善永远带有基督教传教士的气氛，可见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模范中国人镇静地微笑着，勇敢地偷快地，穿着两年前的时装，称太太为师母，女的结绒线，孩子在钢琴上弹奏‘一千零一支最好的歌’。女作家们很快就抓到了礼拜堂晚钟与跪在床前做祈祷的抒情的美。流行杂志上小说里，常常有个女主角建立孤儿院来纪念她过去的爱人。这些故事该是有趣味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般受过教育的妻与母亲的灵的飞翔。”^[5]，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个人际遇，都参与了对基督教的理解，介入了对基督教的阐释，同时也规范着教义理解的内涵。子如先生的基督教教义理解，正因为与现实生活经历不可分，是中国化的更是个人性的。

三、信仰的获取：商业经营终成正果的坎坷经历与新教伦理精神实质的合拍

² ①刘子如《新新游记》第十章“初赴加拿大”日记之三十一“因余是商人，而非传道者，如此舍己，殊难得也。”

查子如先生履历，1894年24岁时入基督教。然而入教数年，生意场上并非因此而处处逢源，一帆风顺。个人衣食问题勉强解决，慈善事业无从说起。《自述》云：初学刻字，继营书铺之后）“旋营卜内门洋碱业，开协兴隆启记字号，代苏广杂货生意，均遭失败。最后因个人信用，承办美商胜家公司缝纫机，全川统销，代办江西全省及湖北之黄石港、黄州、汉口等地之分销，颇获厚利。”子如先生是1901年31岁时主导经营美国胜家公司缝纫机在华营销业务，不是过去雕刻技工的个体工商行为，而是作为完全拥有自主利益权限的商人经商，生意才开始转而兴隆起来的。从1894年到1901年的七八年间，子如先生个人创业活动种种，“均遭失败”的沉重打击，史料证实连续有六次之多！

1930年第九期《希望月刊》载有《刘子如先生事略》‘文，对其创业活动“均遭失败”的经过有简略的介绍：“是年春，有西人周君赴汉，约伊同往，学习印刷工业，寄宿仁济医院之停尸房，忍苦两月，艺术娴熟，返渝与刘楚伯君开印刷馆，随该号停贸不果，特借银二百两正，托孙牧师购交字炉、交字盒全套。有潘梧岗山长及许见田闻之，聘入商务局附设之某报馆任事。年薪二百八十两之谱，机器作租，每月五两。刚处半截，报馆奉谕停业。潘山长见刘君才艺双优，特留暂住，开办印局。后因款项不济，事道中止。乃自设刻字局数年，获利有限。有杨瑞卿君，领隆茂洋行来渝，兼领卜内门洋碱生理及杂货，嘱先生经理其职，服务三载，不辞劳苦，贸易大有起色。旋因意见不合，辞事另图别业，就协兴隆管理，殊舟沉损失资本柒千余两，经无数周折，宣布歇业。又被人控告，诬枉丛生，债魔未脱，病魔继起，九死一生，悲恨交加

如此“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市场经济磨练，非得坚持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否则是硬挺不过来的。就笔者翻阅到的史料而言，支撑起这七八年间生意场坎坷经历的不屈精神，主要源于子如先生对基督教义的虔诚信仰。1902年，子如先生商业获得成功、积累财富的初期，即开始建设他终身为之奉献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自述》这样陈述当时的经历与心迹：“乃邀集教友，发起中华自传教会，觅定小什字玄天宫废址为教堂，加以修葺，子如前后捐款八千七百多元……并年收佃银，作自养基金。时光绪二十八九年事也。是为子如捐助金钱，发扬教义之始。”“发扬教义之始”就在于履行虔诚信仰基督教义的博爱慈善义务。子如先生以个人商业活动的成功事迹印证基督教义，这或许正好从个案的特别角度，说明辜鸿铭对宗教价值及其意义的解释：能够使普遍大众服从并严格地遵守道德规范，能给人以完全感和永恒感。宗教发生的作用和功能主要是在道德和心灵上的，因对上帝有了信仰，也就有了心灵的依靠，也相信了神圣的宇宙秩序，有了忠诚和信义，有了安全和永恒感，也有了做人的原则。“宗教的真正生命所在正是君子之道。反之，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宗教所规定的各种道德法则都只是宗教的外在形式。”^[6]

子如先生何以能够通过个人商业活动的成功事迹，印证基督教义呢？

从事经营美国胜家公司缝纫机在华营销业务，子如先生的社会身份是经商的民族资本家，但他对此自觉的社会角色定位只有两个字：商人。这是与子如先生日常生活的事情息息相关的最实在的认识，也是他最切近的自我人生经验。他没有认为自己是资本家而与其他教友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也没有因为信仰虔诚而自认为具有了牧师职业资格。子如先生只认为自己在以商人的工作证实基督教义，金钱财产的获取只是履行基督教义的过程而已。而且，从事商业经营工作的选择得以彻底改变个人财富能力的机遇把握，关键在于自己的信用，这也是与子如先生的独特生意人经历才有的实际判断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子如先生开始经营美国胜家公司缝纫机的业务，是与其他生意业务混在一起的，小本生意的经验意识因循依旧，并且竟然被合伙人无端诬告，然而因此而出现其人生事业的根本转机：

后与王静轩君夥卖洋碱生理，又领胜家缝纫机批发店，设地点于新丰街。实有奸人运动西人，厉刘君要押金，且愿自出押金五千元，减少月薪。王君乘机排斥下黔，因见先生事业顺遂，所入颇丰故也。刘君只得电上海胜家公司，特派代表顾君来川，调查一切。知先生诚实可靠，仍任为经理，征押金二千元，立公司于白象街，又买古佛寺产业，足容二百余人，开办缝纫公司，成绩昭著。后移公司于状元桥，由是生意发达……《刘子如先生事略》

《刘子如先生事略》是这样结尾的：“嗟乎，刘君特一贫窶之人耳，由信仰而获主恩，以前得资财，璧献上主。五十三文小钱之刘君，今全球知名，吾辈信徒，闻风亦当兴起矣。”由信用而获信仰，“由信仰而获主恩”《自述》因此将个人“信用”作为自己商人身份最重要的品质而“记录在案”是有特别的宗教意义的。这个宗教意义就是“通过个人商业活动的成功事迹印证基

督教义”。将《自述》与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比较阅读，会有更实际的认识，那就是一子如先生的慈善行状，具有鲜明的“新教”教徒信奉基督教的精神特点。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章，摘录了美国早期政治家、科学家、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几段话，第一段话论述时间、信用与金钱的关系以及金钱的“繁衍性”：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代及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凡即使这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说是白扔了另外五币洗令。”“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才巴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书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切记，金钱具有繁衍性。金钱可以生金钱，李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7]p34

马克斯·韦伯分析说，本杰明·富兰克林上述的话，能成为具有公认信誉的诚实人的理想，而且成为一种观念：即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并且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显然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商人发迹的方法，而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昧青明是世间在普遍不过的事），它是一种精神气质。”^[7]p36 这种精神气质渗透到商业等经济活动中去，推动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推动这一变化的人通常并不是那些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投机商，也不是经济发展史各个阶段可以见到的冒险家，更不是金融大亨们，“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8]p50，体现新教伦理精神的“理想类型”特点。子如先生社会职业“商人”的自我认定，是在承担美国胜家公司在华缝纫机推销业务，成功开拓市场获得丰厚利润之后；简言之，子如先生的商人身份，是在他成为一位信誉卓著的商人，能够“证道”时才有的自我社会角色意识。马克斯·韦伯说，“在德语的 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 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点不会被人误解。越是在具体情况下强调这个词，这一概念越是明确。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词在文明语言中的历史，那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诸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职业’就其是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这种意义而言相似的概念的词，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这个词却一直沿用至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它并非源于有关语言的伦理特点，例如，这个词并不是什么德意志精神的产物，相反，它现在的意思来自《圣经》的译文，它体现的不是《圣经》原文，而是译者自己的精神。”^[7]p58 马克斯·韦伯进一步强调说：“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7]p59 在“因个人信用，承办美商胜家公司缝纫机”“颇获厚利”之时，《自述》说：“当时因生活甚低，曾对上帝发誓，愿将所有财产，捐助慈善事业，只留二百金养老。盖圣经有云，生命万物乃上天之赐，享用有余，应还于上天也，此后对于基督教义，信奉愈笃……”。我们或者可以这样演绎马克斯·韦伯上述的话：子如先生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后，对其职业宗教意义的领悟“来自《圣经》的译文，它体现的不是《圣经》原文”而是子如先生自己在商业市场坚苦卓绝，拼搏奋斗而不断成功，个人切实体验的信仰基督教义的“精神”。

四、信仰超越：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当下文化价值意义

子如先生 1902 年“捐助金钱，发扬教义之始”很快成为西南巨商、社会贤达、著名慈善家，历经三十余年后的 1934 年发表《自述》事实力陈“发扬教义”的真实想法和实际作为，所述内容及话语方式，与先生当时的社会知名度及其社会声望明显存在抵牾。《自述》鲜明表达的子如先生的民族国家意识值得认真探讨。

查阅 20 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反基督教的思潮从来没有中断过从民国初年，20 年代到 30 年代似乎越来越强劲，反基督教被看成反帝国主义，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被等同化，反对者看到的是基督教的世俗性层面，即教会殖民性和教徒“吃教”“傍教”等权利性和虚伪性。与民国初年理论层面对基督教的冲击不同，1920 年代的非宗教运动和 1930 年代的民族苦难，都加深了基督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然而基督教在现代中国虽然不断面临社会和个人的思想挑战，以及连续不断的内乱外患的

冲击，但已没有哪一个强势话语能够对基督教进行完全的否定和排斥，于是它也就有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和心理空间，不过它仅属于中国思想界的边缘话语，以“民间的和个人的思想”^[4]p14 存在影响。《自述》陈述的写作动机，就在于呼吁自养教会公正认识、凛然应对内外两方面的舆论夹击，一是教友内部基督教青年会诸人“恶子如捐款为贻捐，公然提起诉讼，发为传单，意在破坏个人名誉与信仰”的劣迹；二是当时“非基督高潮弥漫全国声中，破坏教友之名誉信用者”造成社会舆论无端压力的种种现象。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自述》对国家前途，抵御外来“文化侵略”前景的忧虑，超过了子如先生为自己的名誉、信仰正名的写作初衷：

子如一人之财产名誉不是惜，将来谁敢毁家助善，热心社会事业乎？国难方殷，匪祸益炽，世道衰微，人心日险，社会已呈崩溃之势，挽救之责，端赖仁人，策励进行。不图索称社会领袖人物，昧于私见，竟亡公心，不惜德以报怨，希图中伤，破坏私人之名誉事小，破坏公共团体之名誉事大……基督教义，流传中国，对于社会人心，大有补益，我辈自创教会，用防外人之文化侵略，方庆各项事业，渐臻发荣，未得落后于西人之教会者，诚幸事矣。

这与《自述》开篇陈述“发扬教义之始”的第一段话，对信奉基督教义，经商获利之后发起慈善事业，创建自传教会表述的观念是一致的：“此后对于基督教义，信奉益笃，惟感外人传教，因言语文字风俗等之不同，颇难普及，并恐外人乘机窥视内情，不利国家，应由华人自传。乃邀集教友，发起中华自传教会”

子如先生对个人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从不掩饰，甚至直接面对外国宗教文化界友人的时候亦如此。《綦江私立青山孤儿院史话》这样记载道，1925 年子如先生“将企业 14 万 9 千多银元捐赠给亲自创办的孤儿院、青年会、自养美道会，提倡独立自主，不受制于外人。由加拿大籍牧师文幼章博士的来信最足以说明这点。他说：‘子如先生办事自以为是德度）傲慢，我至今仍感不快。自己创办的事业，不容旁人插手，特别不许外国人插手’。”综观子如先生民族国家意识的发展，三阶段的嬗变过程轨迹是可以清楚发现的

一份 1894 年入教之后到民国初年(1914)，对帝国主义“外族”在中国的侵略行径非常反感，特别是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子如先生一时义愤填膺，发誓“哪年打日本，就去参加”！应该说，子如先生这个阶段的民族国家意识还在非常朴素的情感层面，仅仅属于没有理性认识支撑的自发表现。

1924 年环球考察，不是在国内单一面对“外族”欺负的国家政治想象，而是宗教界人士协调下“国与国的关系”中现场体验，因为基督教义的认同感，民族国家意识一度退入隐性状态，《新新游记》卷三第十章“初赴加拿大”旧记之十七就有这样的文字：“余囊者与友人谈话，亦致疑西人来华传教，无非彼国之侦探者。既到欧美各国，始知向疑之非。例如轮船、火车、工厂、关卡、大小商店，凡云及是信基督者，分外亲爱，同心合意，如同一家之人，临别时，依依不舍，甚至泣下沾襟。对于中国布道捐尤为尽力，不特一己衣食上之节省，虽小孩食糖费亦必省下数分，捐入国外布道会，甘心为之，并不出于强迫也。”^③

1920 年代末到 1930 年代初，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向弱小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子如先生身为商人，国内民族经济的困境应该是有清醒的认识的。1934 年的《自述》强调个人荣辱在其次、国家至上的观念，分明让我们感受到了子如先生如火的爱国热忱。1937 年抗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67 岁的子如先生在重庆以自己的声望“毁家”抗战，组建战地服务团，不畏日寇强敌，亲自率团奔赴安徽前线三年，其民族国家意识得到最直接的表现。子如先生信奉基督教义，且能超越慈善行状的宗教活动意义，生成自己民族国家意识的爱国感情，这其中的道理怎样解释，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启示意义呢？

《自述》强调个人的信仰不容破坏，事实上子如先生入教之后终身自觉维护基督教义的神圣性，对其实在性从未产生过怀疑，而且处处以此作为一种精神姿态左右自己的全部社会行为。基督教义给了子如先生自我超越的信心和精神力量。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一种自我超越。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说：宗教是一种起源于对人的有限性克服和超越的，领悟无限的

^③②又如，刘子如《新新游记》第十二章“再赴加拿大”日记之四“诸君有疑彼辈传教士含有本国政治意味而来乎，实厚诬之甚也。”这种说法，也有针对当时(20 年代)中国大陆非基督教思潮种种议论的用意。

主观才能，“宗教是一种内心的本能，或气质，它独立地、不借助感觉或理性，能使人们领悟在不同名称和各种伪装下的无限。没有这种才能，也就没有宗教，甚至连最低级的偶像崇拜和物神也没有。只要我们倾听，就可以在所有宗教中听到这种精神的呻吟，这是一种渴望，力图要认识那不可认识的，说出那说不出的，渴望得到神和上帝的爱。”子如先生正是早年在渝城艰苦创业，渴望爱而在《圣经》教义宣谕中得到一种“实在性”的精神体验的时候，才毅然抛弃父亲的佛教偶像崇拜经验，^③领悟到基督教义的自我超越信仰本质的。子如先生把这段精神历程解释为个人的天分。

黑格尔认为，人性结构角度看，人的终极关怀的实现并不能在人的世界之外实现，只有通过劳动在自身的内在性中实现。他说：“人，如果独立自主地来考虑，是有限的，但他在自己本身中却又同时是上帝的肖像和无限性的源泉；他是他自己本身的目的，他在他自己本身中有无限的价值，他有达到永恒性的使命。因此他自己的故园是在一个超感官的世界中，在一个无限的内在性中，而这个内在性，他只有通过自然的定在和意志相分离才能获得，只有靠他自身之内通过劳动打破这种自然的定在和意志才能获得。”^[8]，在我们看来，子如先生通过商人职业的有效劳动，“在自身的内在性”中实现对基督教义博爱慈善的证道的。换言之，子如先生信奉基督教义之后，历经磨难，终以个人信用把握机遇，获得商业成功，亲历他所认定的“上帝的爱”才真正进入基督教信仰本质的深度体验的。这样，因为基督教义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证道经历，子如先生有了个人根植于现实的终极关怀实现形式。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据，就是1925年，环球考察之后的第二年，子如先生55岁时的“毁家”助善之举。这个行动的宗教文化意义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子如先生对自身当下存在状态的一种实际超越，表现出非物质享受的纯粹精神性需要的力度。其次，体现子如先生对基督教“彼岸性”的渴望，真正超越过去的自我。第三，表明子如先生进入到他希望的一种人生状态：设定出人生中最高的价值目标和人生最后的价值意义，并形成贯穿自己整个人生过程的精神信仰，朝着这个既定目标劳作不止，既是具体的人生状态，也体现人生的一切意义。因此，《自述》以这样一句话结尾：“今后当侧重于全川孤儿院事业之推广，有一份能力，则尽一分责任，毁誉当无所计也。”

当代学者陈晏清先生，对人的现实存在方式有一个特别形象的解释：“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向‘下’看，是人所源出的‘大地’即自然世界；向‘上’看，是人类所向往的‘天’即理想世界。人类世界则是存在于这‘天’、‘地’之间。‘立地顶天’而‘与天地参’”^[9]“立地”与“顶天”，的存在形态，就是人的终极关怀的本原性结构形式。“立地”需要理性，“顶天”需要信仰。终极关怀能否实现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处理好个人理性与信仰的辩证关系：信仰建立在现实理性的坚实基础上，还是悬吊在非理性想象的半天空随处游荡？子如先生“毁家”助善之后的晚年时期，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堂堂正正的信仰基督教义的人“立地”所需要的理性^④，从而达成其宗教信仰的超越表现：衰年不衰而有不断投资创业的勇气与实践，为博爱慈善事业寻求可靠的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对早年民族国家意识的重建和强化，古稀之年“毁家”抗战。《自述》留下了子如先生上述重要的生平思想线索，因此弥足珍贵。相信随着相关史料的深度发掘，《自述》的价值会得到进一步彰显。

参考文献：

[1]白菲.刘子如老先生在前线[J]前线旬刊第13期

[2]刘子如.毁家助善实录[M]重庆启文印刷局，1934

[3]刘子如.毁家助善实录.新加坡报载刘子如事略译文[M]重庆启文印刷局，1934

^③③刘子如《新新游记》第十二章“再赴加拿大”日记之四：“更忆余父母所奉之瑶池，教其中主张甚力者，为父不传子，兄不传弟，夫不传妻甚么谈理不谈礼，谈道不谈窍，以及头层、二层、三层，渐至则顶三层。所谓三千功，八百果，功果圆满步蓬莱，纯系诈欺取财之法门追银两用罄，饥啼号寒，而传道老师反云：汝终不过考程，佛已弃汝矣。”子如先生对佛教教义非生活化玄虚的批评，是据个人信教经历为例的，反过来也证明基督教日常生活化的宣教吸引力。

^④④不排除子如先生1925年毁家助善之举，有虔诚宗教信仰的非理性冲动的可能，当然还需要相关史料的有力证实。因为人的终极关怀通过信仰而实现，而非理性实现形式就是宗教，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就说过，宗教是现象形态

-
- [4]王本朝.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M]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 [5]张爱玲. 中国人的宗教[A]/张爱玲文集(第 4 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 19 页 123
- [6]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M]海南出版社, 1996. 65
- [7]马克思.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 页
- [8]黑格尔. 历史哲学[M]商务印书馆, 1963378-379
- [9]陈晏清等. 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